

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胡新梅 译

中华书局



国民阅读经典

一部影响日本近百年、影响世界数亿人的传世巨著

菊与刀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胡新梅 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胡新梅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4.7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 - 7 - 101 - 10072 - 3

I. 菊… II. ①鲁… ②胡… III. 民族文化 - 研究 - 日本
IV. 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66206 号

书 名 菊与刀
著 者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 者 胡新梅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5/8} 插页 4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10072 - 3
定 价 28.00 元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

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引言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赴欧洲游历。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选修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F.博厄斯的课程时，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专攻文化人类学，并于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1936年F.博厄斯退休后，她出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十分活跃的学者。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开创人之一，其代表作《文化模式》被公认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致力于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进行民族性研究，而《菊与刀》就是其对日本进行研究的杰出成果。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病逝。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

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并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乃至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迫切需要制定战后的对日政策。当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能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对付日本？如果日本投降，美国要不要保留日本政府机构及天皇？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亟待解决。于是，在二战临近结束时，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本尼迪克特对日本进行研究，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采访当时生活或被拘禁在美国的日本人，观看日本影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资料以及在旅日学者的帮助下完成了这份报告。报告指出：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留并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来对付日本。战争结束后，她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事情的发展也进一步印证了她的预见和推断。因此，可以说这份报告是美国改造日本、分析日本的重要参考文献，文中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战后的美国对日政策，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菊是日本皇室家徽，

刀是日本武士道文化的象征，“菊”体现着日本民族谦和、文雅的一面；“刀”却代表着日本民族精神中嗜血、好战的另一面。因此，融合了菊与刀的日本民族，形成了矛盾的双重性格——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善；尚武又爱美；傲慢又懂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桀骜；忠诚又叛逆；勇敢又懦弱等等，所有这些矛盾都共存于日本文化中，造就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这部著作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社会，通过对其等级制度、战争观与名誉观、情感世界、受恩与报恩以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分析和考察，指出日本人的双重性格都是由其童年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造成的，并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以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1951年，《菊与刀》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被称做现代日本学的鼻祖，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之作，同时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自《菊与刀》问世以来，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受到各国读者追捧，书中所提及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近年来中日关系不断成为国人关心的话题，作为一本分析日本人思维习惯、行为模式以及精神与文化生活的典范之作，更值得我们关注。

胡新梅

2014年4月

引言	i
第一章 战时任务：研究日本	1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14
第三章 各安其位	30
第四章 明治维新	53
第五章 受恩者	70
第六章 报恩	84
第七章 难以承受的情义	100
第八章 澄清名声	111
第九章 情感天地	140
第十章 道德困境	155
第十一章 自我修炼	182
第十二章 子女教育	202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41

第一章 战时任务：研究日本

在美国全力对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令人琢磨不透的。由于日本人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与我们截然不同，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差异，慎而待之。这和此前（1905年）沙皇俄国在对日作战中所遇到的情况一样，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但又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民族。很显然，西方国家所普遍接受的战争惯例对日本人是行不通的，这使得太平洋战争变得异常艰难，不仅要面对一系列的岛屿登陆作战、后勤补给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了解敌人的特性，以便更好地对付他们。

要想做到这点并非易事。自日本国门被打开的75年间，由于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人们总是会用一连串的转折词，比如“但”或者“又”来形容他们，而从来不用这些词去描绘其他民族。一个严肃的学者在描述其他民族时不会说这个民族既彬彬有礼，但又粗野蛮横；既顽固不化，又乐意接受极端的变革；既谦卑温顺，又不愿受制于人；既忠心耿耿、心地宽厚，又背信弃义、睚眦必报；既勇敢善战又生性怯懦；既善

解人意又不愿愧对内心；既纪律严明又难以管束；既兼容并蓄又固步自封；既醉心于菊花的美，又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

所有这些矛盾都共存于日本文化中，就像菊花与刀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日本人生性好斗又和善；尚武又文弱；傲慢又知礼；顽固又善变；驯服又桀骜；忠诚又叛逆；勇敢又懦弱；保守又开放；敏感又刚强；士兵们恭顺服从又高傲不屈。

目前我们迫切需要了解日本文化，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思考日本人的这种矛盾性格，这对日后的战争走向以及战后问题的解决都至关重要。随着事态的发展，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日本人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有没有可能不入侵日本本土就能迫使他们投降？我们该不该轰炸皇宫？如何对待日本战俘？对日本士兵及对日本国民做怎样的宣传才能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并且能动摇日本军队战斗到底的决心？熟知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平到来后，是否要对日本人实行永久性的军事管制？我军是否要与那些负隅顽抗的敌军战斗到底？在国际和平到来之前，日本本土是不是也会爆发一场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会领导这场革命？或者是消灭日本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出准确的判断。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我可以利用所有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手段来研究日本的民族特性。那年初夏，我们发动了对日本的大规模反攻。当时，美国很多同胞认为这场战争将会持续三年，也许十年，或许更长。但是日本人却认为这场战争将持续一百年。他们认为虽然美国人取得了战争的局部胜利，但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日

本的官方公报拒不承认其海军的失利，日本民众也认为他们在打胜仗。

但是6月以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最高司令部两年半以来对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考虑也初见成效，对德战争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而在太平洋战场上，我军在塞班岛的胜利登陆也预示着日本的战败。自此，双方展开了肉搏战。通过新几内亚、瓜岛、缅甸、阿图岛、塔拉瓦和比亚克战役，让我们真正见识到了日本军队的强大与可怕。

因此，到了1944年6月，我们迫切需要回答有关日本的很多问题，不管是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不管是高层决策的要求，抑或是向日军前线散发宣传单的需要，我们的意见都至关重要。在这场对日的全面战争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日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日本的漫长历史，对日本经济与军事上的统计数据，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日本政府想让他的民众做什么。我们还得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及模式，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还得抛开美国人的思维习惯，并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会做的事，他们也会那样做。

我的任务很艰巨。在战争期间谴责对方很容易，但要弄清楚敌人的所思所想却很难。但我必须迎难而上。当前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判断他们会怎样做。由于无法对日本本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我只能利用日本人战时的行为来理解他们，而这并不能成为我研究的障碍。我要把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方式当作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的行为都有

其独特性。他们独特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又是怎样影响战争进程的？他们的领袖又是怎样鼓舞士气，怎样安抚民众，怎样在战场上点兵遣将，所有这些都能暴露日本人的作战方式。我必须认真研究作战细节，以便更好地了解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表现。

可是目前两国正在交战，这使得我不得不放弃对日本的实地考察，这对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为实地考察对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到日本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亲自体验他们的生活，更无法亲眼验证对他们的判断。我也无法观察到他们是怎样做出决定的，他们又是怎样抚养教育孩子的。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是唯一一本经过实地考察撰写出的有关日本村落的书籍，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所面对的很多问题书中不可能涉及。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尽管困难重重，我仍然相信我可以通过一定的技巧和手段来进行研究。最起码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可以利用目前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对他们的生活经历进行调查，弄清楚他们是怎样判断事物的，以填补我们在知识上的很多空白。我相信这种方法对了解任何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研究日本时倾向于利用图书文献，分析历史事件或统计资料，以及研究日本的宣传文字。我深信他们所要寻求的答案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之中，只有通过接触那些真正生活于其中的人才能找到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是说我就可以不阅读文献，或者说不需要那些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士的帮助。相反，这两者对我的研究都有很大帮助。有关日本的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及曾经在日本生

活过的优秀学者都为我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这是在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研究原始部落的人类学家所没有的优势。由于这些部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生活也无法记录下来，这就导致西方人对他们的评论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肤浅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因此，一些实地调查者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只能孤身作战，努力去探寻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他们的宗教最高信仰。对于日本研究，我是后来人，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前辈对日本人的生活做了细致的研究。曾在日本生活过的许多欧美人士在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们的生活经历，而且更令我欣慰的是，日本人也非常喜欢把自己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跟许多东方人不同，日本人愿意自我表露，在这些文字中，既包含他们琐碎的生活细节，也有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的坦诚实在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展露自己，任何民族都如此。日本人在描绘日本时会略去许多他们熟悉的东西。美国人写美国时也会如此。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日本是一个表达欲很强的民族。

在阅读这些文献时，我会特别留意一些无法从表面了解的事情，就像达尔文当初创立其物种起源理论一样。怎样才能理解日本国会演说中的纷杂思想？他们为什么有时候会对一些蝇头小事大肆谴责，却对骇人听闻的暴行轻易饶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态度？我边读边不停地问自己：“日本人为什么会这么怪异？”怎样做才能了解这些现象的背后？

我还看了很多日本人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表现当代东京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影片，然后我会与看过同样影片的日本人进行讨论。他们对影片中男女主角以及

反面人物的看法和我有很大不同。当我看得一头雾水的时候，他们却看得津津有味。对电影的情节以及创作动机我们的理解也不同，但他们的解释听起来却言之有理。就像读日本小说一样，我的理解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会有很大不同。对于日本的一些特有习惯，日本人内部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有些人会急于为日本的习惯进行辩护，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一种人使我学到更多。无论他们是热爱生活抑或是憎恶生活，但他们所描述的生活场景却很相似。

如果人类学家只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资料，那么他所做的工作和所有旅居日本的西方学者有什么不同呢？如果他们只能做到这些，也就无法对此项研究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相信自己有能力，通过一定方法为该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人类学家，我了解亚太地区的很多文化。日本的很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同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等。当然，据此推测在远古时期他们中也许有过移民或相互接触的研究是很有趣的。然而，对我来说，了解这些文化的相似性，并不在于他们之间有何种历史关联，而在于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与差异，去找寻研究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有所了解，因此，我可以把日本与这些邻国进行比较，毕竟他们的文化有很多相似性。这种比较研究对于人类学来说意义非凡。一个部落的习俗可能与其邻国大致相同，但他们也会做些变更，以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变更过程中，他们也许会抛弃一些习俗，尽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却能使这个民族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研究这种具有很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对于人类学家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身文化与研究对象文化之间的差异，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需要改进自己的研究方法。经验告诉我们，文化不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不同。例如，在一些北极乡村或热带沙漠地区，他们会遇到以血缘关系或以金钱交换为基础的部落习俗，这些习俗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仅要研究这些血缘关系或金钱交换的细节，而且要弄清楚这些习俗对部落成员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这种习俗是如何代代相传下来的。

这种差异性研究方法，同样也适用于日本研究。我们深知，美国与日本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美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凡是我们做的，日本人一定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就此认为我们无法深入了解日本，那么这种想法就很危险了。经验表明，客观的一些差异并不能阻碍对一个民族的研究与了解。与其他社会学家相比，人类学家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差异。尽管表面上看来这个民族很怪异，但我们所要探寻的是这种现象得以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在研究部落生活时，我们不能忽略细微之处。一个不懂得比较研究的人，在研究民族文化时，总是会忽略日常生活中那些细小但具有整体性的生活习惯，而正是这些细小习惯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外交官们所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应该学会研究日常琐事，尽管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普通，却不那么简单。当他试图去理解一个部落的穷凶极恶或者是另一个部落的胆小怕事时，当他试图描绘在某一特定情境

下这些人会有怎样的反应与感受时，就会发现，他平时对一些琐事的细微观察有多必要。他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琐事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去发掘他们。

在研究日本时我们应该尝试使用这种方法。因为只有充分观察一个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才能认同人类学家所说的前提条件：任何原始部落或先进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想法有多怪异，他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的。我越是对于日本人的某种行为感到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特殊因素。如果这个发现能够使我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一些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那就再好不过了。因为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获取经验。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我刚开始还有一个假定，即认为那些最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也一定存在着某种系统性的联系。我经常在想：那些纷繁复杂的单项行为是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的呢？人类社会总是会为自己制定一些生活规则，作为处理问题以及评判事情的标准，一旦这些规则得到人们的认可，就成为普遍真理。即使面对再大的阻碍，他们都要把这些真理融合成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人们一旦接受了某种价值体系，就会按照这个体系去思考和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努力追求一种更加和谐的状态。他们会尽力维护这种状态。对于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说，一定程度的和谐是必要的，如果和谐消失了，这个体系也就不存在了。

这样，一个社会中的经济行为、家庭活动、宗教仪式以及政治目标都在这个体系的支配下相互交织、运作起来。他们